

博物館雜誌上發表(註四)在他對於這個

有一句說:「沒有一間房子是為收藏家

的」名言,因為收藏家為

的收

學什

石、鐵、金、銀、銅、

山、錯

博物館人叢語



鑽石探出後處理的方法和他們的用途

配景(Diorama)來說明,人只要在真景

多,有了這種陳列,不得不信 Dickenson

博物館人叢語
法門寺文化叢書之十七

陝西人民出版社
宋伯胤 著



序

博物馆是近代兴起的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它首先出现于 17、18 世纪的欧洲，19 世纪在世界各地发展。20 世纪初，我国才有第一个博物馆。这就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立的南通博物苑。民国元年（1912），在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下筹建了第一个国立博物馆，以后演进为今天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相继建立，到 1936 年发展到 77 所。抗日战争中，1944 年还剩 8 所。1949 年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博物馆有 25 所。1955 年 55 所。1958 年发展到 480 所。经过十年动乱还有 365 所。80 年代以来，我国博物馆事业才得到稳步发展，1985 年 711 所，1990 年 1013 所。1994 年编修《中国博物馆志》时已超过 1500 所。1998 年达 1800 所。这一年，香港有博物馆 30 多所，澳门有近 10 所，台湾省则已发展到 144 所。1999 年 10 月，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在拉萨建成开放。至此，中国博物馆在一个世纪中，几经风雨沧桑，几度兴衰消长，终于从无到有，发展到 2000 多所，形成了覆盖中华大地约多种类型、多种学科的博物馆网络，为服务于各族人民、服务于国家繁荣富强贡献着自己所能贡献的能量。

当代的博物馆已不再被认为是古物收藏所，而被视为青少年的校外教育基地、成人终生教育的学校、人们增长知识、陶冶身心的文化科学艺术的园地。同时，它既是保存和研究人类文化遗产机构，也是进行科学研究和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机构。因此，在世界上博物馆已被视为一个国家文化科学，乃至综合国力发展的一种标志。

但是，博物馆要充分实现自己的社会职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多年实践证明：博物馆必须把自己的各项工作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所有不同类型不同学科博物馆需要研究的共同课题，首先是博物馆学的理论和实践。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博物馆人丛语》，就是伯胤同志多年潜心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的课题几乎涉及到当代博物馆学的各个领域和分支学科，如理论博物馆学、历史博物馆学、博物馆陈列学、藏品管理学、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管理学，以及专门博物馆学等。每一课题的探讨又都显示出他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风和广博的学识，闪耀着不少真知灼见。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博物馆工作中陈列是不容忽视的重点。“主题陈列”最近仍是国内外博物馆学研究的问题。宋著中发表于 1958 年的两篇关于“主题陈列”的论文，可谓早已开创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先河。

藏品管理学中,分类编目从来是核心的科学问题。藏品分类法的研究和拟定更是需要具有丰富的藏品管理和研究经验,同时需要具有多种学科的综合学识才能参与讨论的重大课题。伯胤同志上溯“七略”、“四部”等我国传统学术的源流,借鉴国外科学分类、图书分类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四部四项十进位分类法》。这是一项很有学术理论开拓气魄的壮举!不论实用情况如何,这项研究将为信息化时代藏品管理标准化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于《中国博物馆的百年足迹》的近20篇论文,是我国博物馆史的重要研究成果。伯胤同志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并兼修博物馆学专修科课程的年代开始,平生熟识不少学术界和博物馆学界的前辈先生,加以他留心有关史料的钩沉探微,因此,这些论文中充满着可信的史料,也涵蓄着许多独到的中肯评论。这些将是我国博物馆史中不可缺少的篇章。

此外,关于专门博物馆的研究、关于国内外博物馆的评介等等,都有不少发人深省的见解,恕不一一赘及。

伯胤同志对博物馆学理论和实践的潜心研究,锲而不舍者已50余年。他的丰硕研究成果是对我国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事业十分可贵的贡献。他那严谨不苟、实事求是的学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王宏钧

2000年2月写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序 二

这本《博物馆人丛语》总算问世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因为拖的时间太久了，我实在对不起作者和读者。我是2000年盛夏去南京，在宋伯胤先生家里见到这部书稿的。一看到《博物馆人丛语》，再看看宋先生满眼的期待和满头的白发，我就急了，问宋先生什么时候出版，宋先生半晌语塞，神情木然。我又看了目录，大为振奋，不经宋先生思索，就提出在陕西出版。因为是博物馆学专论，法门寺博物馆曾请宋先生讲过博物馆学，而我这次来是专门请教宋先生，让法门寺历史文物陈列在新世纪初全面上新台阶的，所论对法门寺博物馆今后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且又是博物馆的基本建设。我请求这部书按《法门寺文化丛书》系列出版发行，宋先生猛然一振，就随口答应了，并动情地表示感谢。我茫然了，我们能承接这么好的书还来不及感激宋先生，宋先生反到一再感激起我们来了呢？我不好再问，只是想将书稿快些打印。宋先生一定要我在书内写篇文章，他坚持要放在序的位置，我不敢当；只是想到自己对宋先生这本书要说的话、要写的文章可多，乃欣然命笔。

但是，事情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回馆后，我一翻书，48篇文章全是精品，一下子心情激动起来，想认真读完再写出自己满意的读后感。时间一天一天地飞过，大小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缠在我的身上，我连吃饭的时间都无法落实。我读《博物馆人丛语》的计划就没法提起，当然读后感只是愿望了。不过，这件事日日夜夜都悬上我的心头，我知道我从南京抱回来的不是一般的书稿，而是宋院长用文笔包容的百年中国博物馆，我就是不敢轻易下笔啊，这样以来，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拖越久，直到书稿终校到位，我的读后感还没有下笔。

近日，我请了两天假，躲在法门寺北边的方平山下我农村的家里，想进行我的“读后写”。整整两天，我只读了《丛语》中的几篇文章。这是因为宋先生的文章都是厚积薄发而又深入浅出，许多议论之处都是他五、六十年理论和实践积累的结晶，我是在吃“压缩饼干”，要细嚼慢咽，有些闪光的段落激起我心底的波澜，我不仅要读，还要记在笔记上，作为今后之用。这样以来，我像入了“百宝库”，一下子不知道捡哪个好。我这才明白了，我面前的《博物馆人丛语》，就像法门寺地宫那唐代帝后丝（金）服饰供养库一样，五彩斑斓的蹙金绣、蹙银绣、贴金绣、绣加绘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要总领其要地阐述，我确是做不到，因为那一个品类就是一组系列文化呀！但是，我澎湃的心情按捺不住，我深切地感到这是上一个世纪中国博物馆学的总结和展示，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对新世纪我国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发展，对新一代博物馆人的成长，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对于这部书，我目前虽有许多感受，但还形不成理论的思考，写不出文章来，真所谓“宋老文章啃未动，眼前有景道不得”，但我以后要认真

地读，认真地消化、吸收，认真地写出文章来。现在，就宋先生与《博物馆人丛语》，我写一点小话，不知是否合适。

这本《博物馆人丛语》来之于宋伯胤先生五、六十年理论探索与实践，而这五、六十年又是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探索过程。虽说是娓娓道来，但经纬纵横，是一个博大的空间。我感受到这一点，是从他的日记中发现的。1996年，石兴邦先生在西安召集轩辕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相聚会上。一个寂静的晚上，我进了他的房间，眼前的景象令人振奋：江西社科院陈文华副院长在一个桌上打电脑，撰写新一期《农业考古》综述，而在一边的床头桌旁，宋先生在笔记本上“龙飞凤舞”。屋里像一个车间，两个人各忙各的。我站在宋伯胤先生身后看，他神情平和，面带微笑，像是和笔记本对话一样，在上面写着。内容是对会上见到的老友和学术交往的记述，既是论文，又是随笔，我心里一下子热了起来——他是这么做学问？我大胆说了句：“宋先生，我想看看您的日记”。宋先生笑了笑说：“全是平常事，家常话，见笑了”。我贸然打开一看，眼前是为他的家乡陕西耀县县志写序的追忆。而这篇日记是对明清两代纂修耀县县志的张琰、乔三石、汪灏和陈仕林四人志书的比较分析。看得出，其中对乔三石的评价，一部分来源于宋先生上学时受到赵万里先生的启发，这又是五十年间学术积累的“串连”。以后，我读耀县新志宋先生的序，发现成稿于甲戌即1994年正月。那么两年后宋先生又把这个已经发表过的学术结论翻出来再梳理，使我感到宋先生每时每刻都在“织网”，他要用这个网，网络一切有用的资料，而不使漏掉，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个“器物”。有些发表了，就是展示；还没有发表的，就在心里笔记里珍藏着，一遇时机，随时都可展示，而他是不管展示与否，都一刻不停息地在做“器物”。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我过路南京，匆匆去看他，他说：别急，这里有你用得着的，他小心翼翼地包了一大包袱给我。回来一看，都是他五十多年阅读过、用过而现在根本找不到的佛教资料书，其中有关于“凤翔阿闍黎道贤传密教为清泰帝所重，随驾入洛”一条资料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史载唐“会昌法难”后密教式微，这位“凤翔阿闍黎道贤传密教为清泰帝所重，随驾入洛”时在934年，这就说明唐密的“地面文章”大有可做之处，使我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宋先生做“器物”，不单是一个“模式”或一个“质地”。他的广泛和博大令人佩服，有时真不可思议，他有些论点和资料是上中学时候的，有些是域外的。哪来的这么多思路 and 灵感？哪来这么多精力？来之云南的声音这样说：“剑川石宝山石窟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但是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有正式记录并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这项事业的拓荒人是谁，是宋伯胤——他是剑川石窟的最早研究者”，他们写道：“‘大理有名三塔寺，剑川有名石宝山’。被称为南天瑰宝，可与敦煌、云岗、龙门、大足等古代石刻媲美的剑川石窟，如今已经成为到大理观光旅游、科学考察的一处‘热点’。尤其是研究南诏、大理国文化艺术、文物考古、宗教民俗的学者，剑川石窟更是他们‘魂牵梦绕’。那么，是谁最先把这里的石窟文物、艺术价值披露于世人，引起各方重视，直

至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不能不首先想到宋伯胤先生，他是这项事业的拓荒人。最早到剑川石窟作调查的是宋伯胤先生。作为我国资深的文博专家，他于1950年8月参加政务院组织的中央访问团，到云南作民族情况调查。他所在的二分团调查范围是大理、丽江、保山、蒙自等专区。当时交通不便，工作条件艰苦，他长途跋涉到剑川、丽江，除考察白沙宗教壁画，重点就是深入石宝山作文物考古。他把调查结果写成《剑川石窟》一文，刊载在1957年4月《文物参考资料》上，1958年由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剑川石窟》单行本。可以说对剑川石宝山石窟的发现和研究，宋伯胤先生是筚路蓝缕第一人，之后才引起众多的学人钟情石宝山。石钟山石窟现今被誉为‘南天瑰宝’；‘是灿烂的东方文化瑰宝，也是世界艺术的宝藏’。2001年剑川石钟山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中外专家学者认为：‘剑川石窟堪列世界文化遗产’。而最早对剑川石窟作科学考察的宋伯胤先生，是这项事业的拓荒人。北大考古系、云大历史系、剑川石窟考古研究课题组《剑川石窟——1999年考古调查简报》（国家级刊物《文物》2000年第7期），把宋先生早年出版的《剑川石窟》和调查成果，称为‘应是剑川石窟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对他的博大，而来之祖国南方的印象是“他除了考察剑川石窟、丽江白沙宗教壁画，还参与过苏州公所、会馆、碑刻、西藏寺庙文物考察，以及长沙等地的重大考古发掘。研究领域涉及古陶瓷、纺织、计时仪器史等多方面的专题。每研究一项都有专文问世。他为文博事业贡献一生，虽已届龄退休，但在学术研究工作方面，仍孜孜不倦，永不休止。九十年代去香港、日本讲学，还在台湾出版了他的紫砂论文集《紫砂苑学步》，由季羨林题签。这本专门研究紫砂陶的专著，被誉为‘即使是研究紫砂陶的专家学者，也都应当人手一册’。接着又把研究陶瓷发表的几十篇论文和对古窑址踏勘手记，编辑为一本《宋伯胤陶瓷选集》，2000年去河南参加清凉寺汝窑窑址新发现的座谈会和新闻发布会；归途应邀到河南省博物院参观学习。接着由西向东，到上海昆山市参加我国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逝世1500周年纪念座谈会，作为专题发言。下半年又挤时间撰写《茶具》一书，从古代一直写到当代。内容并非单写‘茶具’这种‘器物’，而是涵盖了茶史、茶俗、茶文化、图文并茂，是具有科学价值和艺术欣赏性及可读性的专著。”

那么，北方的印象又如何呢？我有一件事可见一斑。那年冬，我到北京，他打来电话，说他的《紫砂苑学步》台湾等着出书，书名想请我面求北大季羨林先生题写。因为前天我刚去了季先生家，现在怎么个去法？我电话里问他，宋先生答道：“你可以向季先生讲，四十年代常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北大历史系学生宋伯胤请他题书名。”我先给季先生打电话，季先生一听十分高兴，就说：“记起来了，我马上写，请告诉我他的地址。”我真感奋，学界佳话无尽，居然一个电话，季先生就连接了五、六十年前的事，看得出他的高兴处在于宋先生当年与季先生的文章交往。

二

去年六月，南方的一家报纸有篇写宋先生的文章，对先生的道德文章谈到另外一面，即宋先生的学术之精，也就是古人崇尚的“由博返约”。文章写到：“宋先生的著述

并非时下某些‘多产’作者的‘赶潮’之作，而是‘精品纷呈’。这与他在北大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又在文博学术殿堂多年的实践和钻研有关。可以说是北大优良学风的传承。我们阅读他的任何一篇著作，都会产生一种信任感。可以举例说明：宋先生有篇文章寄给一份颇有知名度的学术刊物。这家刊物对来稿循例要送请专家审查。主编把宋先生的稿件送审时被退回。这位负责审稿的专家谦逊地说‘审查一位国际知名学者的著作，不敢当’！这就是对宋先生治学的‘信赖感’。宋伯胤先生1921年出生于耀县，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即投身文物博物馆事业，在南京博物院工作40多年，是我国著名的文博专家。在他担任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南京博物院副院长职务期间，主持并参加陈列设计与藏品管理，先后结合工作经验，写出《论藏品编目》和《论四部四项藏品分类法》，后者在文博界有‘宋氏分类法’之誉。”

只要稍微翻一下对宋先生的各种著作的述评，就会发现他所出的专著、论文，都是他反复雕琢之后才出手的。眼前的这部《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非常具有代表性。对于王徵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宋先生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是特定的社会中的一员。因而，对于人的认识和评价，只能从完整的社会背景中去透视才能获得较为符合实际的答案。所谓‘完整’，还包括一个人是如何对待和承受固有的传统和外来的科学知识两个方面”。这个标尺，是他长期研究历史人物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早在四十年代，即宋先生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从山居咏看王徵的思想和信仰》，提出：“惟有能勇敢适应历史发展的人，才是那一时代的‘强者’，才能代表那一时代的灵魂。在当时，这些‘强者’们或横遭非议，或备受歧视，甚至招来杀身大祸，但对他生长呼吸的那一个时代总算尽过一番力量，有过一番创造，后代人是会给予一个最公正的评价的。”他面对的王徵，就是这样一位时代的强者，又是一位没有及时得到公正评价的历史人物。宋先生拂去历史的尘埃，从王徵的思想、政治经历，探讨了天主教对他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可能与途径。对王徵的科学成就和宗教信仰做出了公正的评价，恢复了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此书一出，立即引起积极的回应，学术界的评价是：“在中国科技文明史上，明代的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杰出科学家的名字早已为一般世人所知晓，他们为中国科技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亦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但是，历史往往也会因某种特定的原因而造成一时的疏忽，致使一些本应凿刻在人们心中的人物事迹被逐渐淡忘，这实在是一种不幸。在明代，陕西泾阳人王徵当时就与徐光启等人齐名，他不仅亲自设计机械制造，还亲手翻译了西方科技著作，享有‘南徐北王’的盛誉。但后世知之者甚少，研究者更是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一大憾事。著名学者宋伯胤先生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一书，可谓填补了一大空白。该书是由宋先生花了近半个世纪的心血撰写而成，全书25万多字，分‘年谱’和‘附录’两大部分，为我们系统而全面地展现了一代科学伟人的足迹，其中‘年谱’部分，要言不烦，无征不信，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搜罗剔抉，去粗取精，准确客观地再现了王徵的一生，使我们对王徵努力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促进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了全新认识。‘附录’部分由两小部分组成，一为王徵著作选和所译外国科技著作选；二为后人研究王徵资料选。‘附录’部分与‘年谱’部分珠联璧合，互为表里，使全书在结构安排上显得周到精密，既

体现传统人物传记的写作风范，又富有一定的创新精神，读者一卷在手，必将受益匪浅。”

1997年，宋先生的《紫砂苑学步》在台湾出版了，台湾学术界称此书的问世为“紫砂终极审判”：“紫砂是中国这个陶瓷大国、陶瓷收藏群最多的一项，然而紫砂的相关学术研究却也是最脆弱的一环”。面对《紫砂苑学步》“这样一本紫砂经典巨著，真是令人心绪激荡的。多少紫砂陶史上的迷雾，在宋老旁征博引、严谨求证的治学态度下，逐一拨云见日，水落石出。更重要的是，透过宋老的如椽巨笔，我们惊喜地发现，紫砂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艺术养分如此丰美！”来之台北故宫博物院老一辈学者对本书的学术考证，结论深刻而严格：“作者历年为了撰写这些文章，曾走访全国许多古窑址，特别是宜兴丁蜀镇去过不只一次，访问各地匠师及著名收藏家，以及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茶具文物馆等公私收藏；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各地考古发掘的实物；举凡有关于紫砂陶器的任何文献材料，无不勤搜敏求，‘上穷碧落下黄泉’虽不能说是尽赅无遗，而其收罗之富，取方之广，当今也不作第二人想。因此，我可以这样说：资料裒辑的丰富，正是此书的特色之一。

更重要的是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史料，但绝不轻信陈说，人云亦云。因为他本人有深厚的史学素养为基础，对材料使用都经严格过滤，去芜存菁。尤其着重的是应用科学的考古学新知，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这是作者治史的基本理念。作者研究紫砂陶，非如一般止于考据、鉴赏，他是要从史学的角度为出发点，以探究其人文变化。所以他说：“一部紫砂陶史，绝不只是若干紫砂壶的罗列，而是要写紫砂陶人及其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紫砂陶文化的人文透视》）。作者所最关心的是陶人，是社会，也是历史。

在另一篇《寻根的尝试》，作者认为“工艺美术品的创作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和人生的表现”。又说：“凡可称做文化艺术的东西都有粗壮的根底。”一方面，他要探本穷源作寻“根”的尝试，这是尊重历史；但作者解释说：“回归根的运动，实际就是对现实文化的超越。……有勇气把批判之剑举向自己，另辟蹊径，剪除荆棘，去寻根的”。作者所要斩除的，是那些狭隘的流派、门户之见、孤芳自赏等等习性。有决心剪除旧习，也就是有创新的意愿。创新也是历史的另一面。“寻根”是寻找历史的脉络，进而才能掌握历史的动向。作者还说：“无论是对传统工艺的接受，或是对乡土气味的表现，或是与文人学士的合作，其关键都在那些凭着大脑与双手进行‘手的运动’的人。”作者在此所强调的仍然是历史与人文，同时也在于提升此项研究的文化层面。

放眼中国工艺史，作者是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他谈起紫砂陶器的形制，便经常列举其他各种不同材质的古器物作比较研究；如谈时大彬的紫砂壶，除了关心全面陶瓷工艺的发展、技术的传承、观察到一些细微的变化；也谈到他和同时期的锡工、银工相互影响，都兼顾到时空的因素。

作为一个博物馆员，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来客作鉴定。古物的时代、真伪，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件事看似平常，但要做到准确无误确实不易。本书作者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如何鉴定一位工艺匠师作品？如何区别原作或他人仿制作品？十分缺乏信实的历史；缺乏判别考证和审定其本身历史艺术价值的各种模式。”作者为这本书前后

至少投注了十五年时光，透过此书，读者知道紫砂陶的来龙去脉。作者用了更多的篇幅，意在寻觅一些可信的‘模式’籍为识别真伪的标准。例如向为世人所宝贵的大彬壶，因其名贵，赝品便愈多，该如何辨别真伪？作者为此慎选的一件‘模式’是一九六八年在江都丁沟镇出土的明万历四十四年入葬的曹姓墓中，带有‘大彬’款的‘六方紫砂壶’。作者确定它的真实可靠性，不只是因为它带有‘大彬’款；又与这件器物同一墓出土的碑刻上的纪年，而明白显示其存在的年代；它的造型精粗并见，有继承亦有创新，在这方面例举出六点特征，从而判定它是时大彬晚年的作品。

正如一位英籍学者发现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款的青花瓷瓶，后经考古学家波普研究的结果，断为元代青花中‘至正型’的标准器，而成为此后对元代青花瓷器的断代的准绳。如今本书作者在紫砂陶器的断代研究方面，找到了这样的一件标准器，定为时大彬晚年的标准模式。作者又在那篇《紫砂历史上的新证据》文中，快速扫描过了紫砂壶的从来，分辨纪录资料的可信与不可信，然后说出他如何应用考古学的新材料，从形制、技法、胎质、烧造，多方观察比较而得出结论。这结论是：‘紫砂历史如何开篇，请向考古材料寻觅。’他所提供给读者的，不只是有此结论，同时也说出他的经验和研究的方法。读遗山诗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此书作者所想要给予读者的，不只是绣品，而是金针。”

三

不要读宋先生别的一本本著作，就这部《博物馆人丛语》，就足以使人感到他本人就是一部大书。我翻阅着目录，开头就是中国博物馆学的基础理论，而用王振铎先生从事博物馆工作五十年的实践开了一个“专题陈列”。而藏品编目和分类的理论探索和科学实践，成为“宋氏分类法”，具有中国博物馆学的特色。从心理到管理、到文化人类学，到博物馆与学校教育，一步步展开，再到专业博物馆和一个城市的博物馆群体，再一个个论述纺织、钟表、瓷器和遗址博物馆，还有历史博物馆与科技史，等等。第二部分中国博物馆的历史足迹和与世界博物馆的勾通记录，主要是通过对百年中国博物馆的代表人物，从张謇、蔡元培到郑振铎、王冶秋，宋先生通过他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提炼功夫，用他那文采四溢的笔调，描述了这些博物馆人包括鲁迅、严智怡、杨钟健、曾昭燏、林惠祥、王献唐、向达、韩寿萱、沈从文、武伯伦等的中国博物馆建树，一个一个体系，这实际上是宋先生用自己的文章，给我们建造了一个别具一格、催人奋进的书上的“中国博物馆人”博物馆。你看哪，有建设第一个博物馆的，有建树博物馆观的，有中国文化主将与博物馆，有究心民族文物第一人，有博物馆“三使命”与“三种工作”，有“四大功用说”，有历史学家、教育家、著名作家、考古学家与人类博物馆、地方历史陈列、乡土博物馆、科学技术等，还有博物馆人的典型形象等等。第三部分中国博物馆人的中外博物馆文化交流，笔触五大洲，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还有，在附录中以笔记形式谈博物馆陈列主题结构和主题陈列计划等等。即使搁笔之前说的几句话中，宋先生也深情地讲到自己五十多年“学会动手和眼力的训练”，“从田野调查发掘到室内整理保管；从陈列设计到说明讲解；从考察观众的心理动态到观察实物的上下内外蕴含等实

际工作，我曾得到充分的机会和支持，能够投入参与，并在开发广大观众的理解博物馆方面，进行探索和试验。”我深深感到，这就是宋先生的“行”。

用不着我再展开宋先生之“行”的其他著作，仅《博物馆人丛语》中，宋先生把全书的精神要旨，苦心汇积为《藏品保管员的一天》，就足以说明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足迹是怎样放射出文化和智慧的光芒的。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宋先生没有简单地记述保管员一天都干了些什么，而是把保管员放在中心位置，让他像李德伦大师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世界名曲那样，指挥着这库房，这么多各类文物，依照文化研究和交流的曲谱，进行着历史文化“交响乐”的“独奏”、“独唱”和“大合唱”。这位指挥家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换上工作服，走进“演奏大厅”，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认为，这里就是国家文化财产的重地，也是他的工作室和学习室，更重要的一点，这里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岗位，是他倾心相爱、与生命相伴的事业。而这里的每一件文物，如同指挥家了解自己乐队的每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表演水平、甚至今天的心情，熟悉每一件乐器的音响水准一样，他都要对其家世、族谱、形态和习情，了解得清清楚楚，如同指掌。使他高兴的是，这些文物有的送进教学课堂和教研室，有的被陈列在展厅，他就像指挥家一曲终了台下掌声雷动那样心情激动。

这个岗位十分特别，他一旦进入角色就不能自己，把全部身心都投入进去。你看，自然界的阴晴雨雾都压在他的心上，不时地调整这室内的温湿度。你看，他每天两次上班都要把所有文物审视一遍；你看，他接受一件新藏品，就像热情的医生接受住院病人一样，编目卡、藏品档案和医生为病人做全面检查一样，小心、谨慎、深入细微而又体贴入微。对于藏品的现状，他像主任医生不满意病人病历文字叙述一样，思量着科学的表述方法。

在这一天里，最精彩地还是他在博物馆与社会交流那短暂时间的劳动和付出，一般人不易觉察，也不容易做得十全十美。几位大学历史系教师要查看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出版的报刊，一般人做一般接待也没有错。但是，你看他：“在客人进入参考室前进行了八道工作程序；参考室的环境和条件具备六个要素，又达到两不。而他在藏品前又与客人进行了四道工序。所有这些，不但熟练、准确，而且只有五分钟各人需要看的文件就稳妥地放在案子上了。你再看他，“戴着洁白的手套，双手小心翼翼地把文件展开”。“此刻，最忙碌的还是他，一面要把报纸打开，收起；一面要察言观色，倾听议论，暗暗记在心里，以便把客人发表的高见，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送走客人，在进行四项程序之后，“把客人们的议论整理誊清，装进藏品档案。”这个“装进藏品档案”特别引人瞩目——他自觉地在文物和社会中间架起了一座金架。而藏品档案里，不仅装进文物的所有资料，更重要的是装着他对文物认知过程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积累。这次有了新信息，他让文物“予人方便”的心理要求又得到一份满足，他由衷地高兴了。他还要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一道道程序后，完成客人留下的拍摄文物资料照片的要求。但这些工作，他认为自己是应尽的义务。在一丝不苟地又一次接待客人进库房参观后，他继续编辑藏品专题目录。他要将卡片改为目录，满足无法来本馆参观的人的需要，他认为这是他分内的工作，因而长年累月，孜孜不息地去完成。

在这一天里，最感动人的，还是他自觉著录1943年闻一多教授在西南联大写的—

篇题为《字与画》的专论，为了弄清鲁迅在字与画起源问题上的观点，又去图书馆借来两本参考书，他不仅关心新近再版的《闰一多全集》是否收入他著录的这篇文章，他还关心新近收集的几封革命烈士信札的科学保护，就这一念的闪过，他心里喊着：“严厉批评我吧，可爱的祖国和人民！”

这那里是藏品保管员的一天，这是“驰骋在疆场上的战士，一个战斗胜利结束了，又奔赴另一个战场。”仅这个藏品上架，在别人看起来呆板、枯燥、没有出息的工作，而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多么充分、多么自由的学习机会，也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看看宋先生笔下这两段话：“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做好基础工作。敞开博物馆的大门，予人方便：为各行各业人才的成长提供攀登的扶手和阶梯。这是因为，他们保藏的珍品，件件是历史的注脚，是文化的精华，是智慧的结晶，是人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艺和技术的信息。”“保管员深深懂得，这些稀世珍宝与将来很远很远的人和事有着密切联系。随着岁月的消逝，它们会变得更加贵重，更加光彩；而保管员心中反复筹划和牵挂的正是为着永远保证这样的价值。从他手中经过的每一件珍品，都是有千斤重的分量啊！”

我十分明白，宋先生笔下的《藏品保管员的一天》既是对保管员工作的理想，更是他自己工作的实践；不，这个保管员一天的工作，宋先生是一天天这样走过来，他就是那个保管员，保管员就是他！请看这篇文的结语：“啊，保管员，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分子。他们的一天，和机器旁的工人一样，和田野里的农民相同，朴实无华，默默无闻。但当观众在博物馆里看到保管良好的文物时；当科学家从文物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科学佐证时；当子孙后代通过形象而了解到祖国的悠久灿烂、富有革命传统的历史时，一定会感谢他们辛勤的劳动。他们今天为此付出的一切将在历史画卷中闪光！”

四

细读《博物馆人丛语》，体会宋先生的点点滴滴，我看到他有一个根本的信条就是“真”，真真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宋先生治史是承袭自北京大学传统，学风开明，兼容并包。北大是中国新史学的摇篮。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大师级的学者，少有不与这所学府有一些渊源的。宋先生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到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今南京博物院）。从此投入了他毕生耕耘的事业，也由此踏上了学术研究工作的漫漫长路。南京博物院现在在已是国际知名的博物院。在中国博物馆史上，这个博物院的建立，实有其不可忽视的划时代的意义，值得他为之贡献毕生精力。老一辈学问家这样看他：“从北京大学到中央博物院，宋伯胤先生是从一所知名的最高学府，走进了一座收藏最丰的学术文化殿堂。他承继了此一事业直到届龄退休，贡献其一生。但在学术研究工作方面则是永不休止的。他传承了早年所树立的那种学术研究的风气和治学的方法。这方法是科学的，是严谨的。就像胡适博士说的：‘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宋伯胤先生便充分做到了这一点。他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因此我们阅读他的任何一篇著作时，自会产生一种信赖感。”

在这条最为真实的治学道路上，宋先生每迈一步，都是实实在在的。1990年9月9

日，首届法门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宋先生走上讲坛，以“秘色越器”辩证的透彻论析，拂去历史尘埃，还法门寺地宫皇室秘色瓷器以历史的本来面目。1991年，他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又发新论——《秘色抱青瓷之响》，将瓷文化界百年争论不休、拭目以待的秘色瓷问题，以法门寺唐代地宫实物，做了全面、深刻的论述。1998年11月25日，在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他因一部专著的定稿问题而未能出席，但他的《瓷秘色——唐文化的实物证言》，以“瓷秘色”界定，贡瓷——并不是“贡窑”的“御物”，唐代诗人说唐瓷，唐文化的实物证言等，汲取了法门寺唐代地宫秘色瓷出土以来国内外对此的学术讨论成果，进行历史辩证，确立宋氏秘瓷说，赢得了与会专家的赞许。

在与宋先生不多的接触中，我深刻体会到他的学术文化“网络”的真情实意。我最喜爱、最感享受的，是与他谈恩师、谈治学，每次他谈到恩师时的真挚感情，使我感动不已。他不至一次地谈到他从小学到大学、到南京博物院的一个个恩师。这些恩师，有的实际是他的业务领导或是他的前任，他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时刻挂念在心。在几次谈话中，宋先生一再深情地谈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提到这样一件事，1979年沈从文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而当沈从文先生逝世后家人清理沈先生书信时，发现还有两封未曾寄出的给宋先生的信，就寄给了宋先生。宋先生一看，与前一封是一回事，但一封信写了三次。第一次写得十分详细，第二封改简单了，第三封即他收到的那封，写了简单的几件事。为什么，这里面包含着他与沈先生的深厚感情，沈先生怕说多了给宋先生惹麻烦而一次次削减信的内容。大作家居然为给自己学生辈的人写一封信，连写了三次。我看过这三封信，第一封6页96行，蝇头小楷；第二封字大一倍，64行；第三封只有36行。对于宋先生来讲，这是最深切的关怀，令他常记在心，激动不已，遇上知己总要说上一阵，就算是自己的抒发。今年九月中旬，宋先生不顾酷热，长途跋涉，赴湖南凤凰出席沈从文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从自己1948年初给《平明日报·星期文艺》的投稿而得到沈先生的亲切教诲，由此开始与沈先生的文化学术交往，把沈先生“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获得真知”、“治历史文物必须与文献学、考古学结合”，“捧起不是用文字写成的书认真读去”的认真实践、严谨治学、最富创新的精神全面勾勒出来，以作纪念，以警后人。宋先生引用了他早年读过的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里夫在名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的一段话：“对于常规的历史学的咬文嚼字，主观的解释，依赖无法证实的观察力，关注表面事件，不合逻辑的争论以及玩弄与自己对立面而毫无差别的陈腐的心理学格言，这些做法，都使他们感到厌恶”。宋先生说，他每读这段话时都想到许多问题，总感到脸红，并为沈从文先生“沿着那条新的治史之路已经走了半个世纪”引为自豪。这就是宋先生深处的真切，他告诉我，今年会上，见到几位沈先生的学生，大家在一起抱头大哭，他们哭的是“沈从文先生实在是我国文物、博物馆界一位功在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见闻所及，他是最肯多思、最肯实践，治学最严谨，最富创新精神的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理毁谤，不管冷暖，一心扑在为建设中国博物馆学和历史文物研究法的大事业而献身的大学者，更是不应该那么早就离开我们的人！”这，就是宋先生追求的真，也是宋先生的真。

五

这部《博物馆人丛语》就要出版了，美中不足的是，它现在还圈在《法门寺文化丛书》的行列，为法门寺文化和法门寺博物馆的建设发挥作用，而不能面对全国、面对海内外发行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怀着这份无法弥补的愧疚心情，我向南京中山门清溪路1号南京博物院家属区宋伯胤先生家走去。但是，这里已无昔日的庄严和宁静，希尔顿大楼挡住了南京博物院的半边天，宋先生家的楼下已成了商品作坊，吵杂一片。上到二楼，只见脱漆的门上挂着锁子，尘土已积了一些，一问，才知道他暂时住在南博东边半山园的女儿家里。

我找到了宋先生的寄寓，这里紧贴着南博东边。一眼望去，南博尽收眼底。宋先生读罢、写罢，一抬头南博就在面前。他女儿动情地讲：“他说什么都要和南博在一起！”晚饭后，宋先生拉着我的手说：你看，这眼前的楼、眼前的院，还有那楼里院里的历史文物，南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啊！蔡元培、李济、傅斯年、周仁、梁思成、郭宝钧、曾昭燏、吴金鼎、马长寿、庞薰琴、王振铎、李霖灿、谭旦冈、尹焕章……他们都从这里走过。在这条路上我也跟着学步。每当我一走上去，就感到他们在拉着我向前，永远向前！”这是宋伯胤先生在今日半山园的情怀！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从半山园漫步到清溪路，再由清溪路漫步到半山园。中山门托起的那一缕缕朝辉，撒满老人一身，他平稳地这样走着、看着他围着转的南京博物院。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就是宋伯胤先生！

韩金科

目 录

序 一	王宏钧 (1)
序 二	韩金科 (3)

第一编 大书与小书

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	(3)
试论陈列本质及其目的性——为王振铎先生从事博物馆工作 50 年作	(6)
论博物馆藏品编目——为南京博物院建院 60 周年作	(13)
论博物馆藏品分类——兼述“四部四项分类法”	(30)
博物馆需要心理学	(75)
博物馆管理的思考	(83)
博物馆建筑二题——提两个供博物馆建设者选择的观点	(89)
对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构思	(101)
从文化人类学看博物馆材料	(109)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兼论博物馆专业的学制与课程	(115)
对专业博物馆的构思——从钟表博物馆说起	(133)
对苏州城市博物馆群体的构思——为苏州博物馆建馆 30 周年作	(141)
历史博物馆与科技史	(151)
试论南通纺织博物馆总体设计思想	(154)
对建立钟表博物馆的构思	(159)
走向新世纪：耀州窑博物馆	(165)
保护文化遗产：遗址博物馆的根本——为西安半坡博物馆建馆 40 周年作 ...	(174)
大书与小书——为《遗址博物馆学概论》出版作	(179)

第二编 中国博物馆的百年足迹

中国博物馆的历史足迹	(185)
与世界博物馆沟通的记录	(198)
张謇与南通博物苑	(207)
蔡元培的博物馆观	(219)
鲁迅与博物馆事业	(227)

究心民族文物第一人——严智怡·····	(237)
杨钟健的“三使命”与“三种工作”·····	(243)
曾昭燏的博物馆四大功用说——为曾昭燏先生逝世 20 周年作·····	(252)
林惠祥与人类学博物馆·····	(261)
王献唐对地方历史陈列的贡献·····	(269)
向达：倾心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学家·····	(278)
中国博物馆教育家韩寿萱·····	(284)
敬礼：乡土博物馆学家沈从文·····	(290)
吾爱吾师，吾更爱吾师的“博物馆观”——为庆祝武伯伦先生 93 岁大寿作 ·····	(298)
“默默的望着那春江”——记冶秋同志二、三事·····	(302)
实施博物馆实物教育的途径：科学与艺术——忆王振铎先生二三事·····	(308)

第三编 攻错之什

向印第安墨西哥致敬——记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317)
墨西哥遗址博物馆走笔——试论遗址博物馆的两个方面的特征·····	(323)
设立在贫民区的“相邻博物馆”——访墨西哥城“博物馆之家”·····	(330)
把文化遗产还给人民——介绍墨西哥惠拉博物馆·····	(332)
访日本几个陶瓷博物馆——濑户、唐津、备前·····	(334)
日本露天博物馆“明治村”漫步·····	(345)
参观乌克兰民族学与民间工艺博物馆手记·····	(349)
幽古拉湖畔的露天博物馆·····	(353)
斯大林故居博物馆·····	(356)
来自华西的奉献——四川大学博物馆剪影·····	(358)
藏品保管员的一天·····	(360)
一篇未曾写出的文章·····	(364)

附录一：

谈谈“陈列主题结构”——学习陈列方法的笔记之一·····	(365)
------------------------------	-------

附录二：

谈谈“主题陈列计划”——学习陈列方法的笔记之二·····	(371)
搁笔之前再说几句话·····	(377)

第一编

大书与小书

